



文史知识

政教室

3份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其他 钟敬文

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 程毅中

什么是「隔」与不「隔」 黄保真

尊左与尊右的源流 黄发忠

混一南北的隋代官制 杨志玖 张国刚

文史知识自测题

1985

WENSHI ZHISHI

《静听松风图》
〔南宋〕马麟

（参阅本期《静听松风图》浅析一文）





医药学院610 2 01496987

文史知识

1985年第6期

(总第48期)

治学之道·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其他

——答《文史知识》编辑部问

钟敬文 3

·学史百题·汪洋辟阖 仪态万方

——谈《庄子》的语言艺术

曹础基 10

·历史百题·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

瞿林东 15

·怎样读·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

程毅中 22

诗 文 欣 赏	什么是“隔”与“不隔”(怎样欣赏古典诗词之十九)	黄保真 28
	楮中有玉——杜十娘内心世界简析	张国庆 32
	人化了的绿色精灵——绿衣女	何永康 37
	书一代之事 创五言之新——杜甫《北征》浅析	刘树勋 40

·文史书目答问·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

高路明 45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

王永兴 48

·古文字学十二讲·

第八讲 纸以前的书籍

李学勤 53

文 化 史 知 识	尊左与尊右的源与流	黄发忠 58
	中国古代的几种记时器	管成学 62
	略说斗鸡	王赛时 68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连载十七)·

“复废六官、还依汉魏”——混一南北的隋朝官制

杨志玖 张国刚 71

图书资料

人物春秋	刘勰的一生	朱迎平	76
	两度出塞的盛唐边塞诗人岑参	陈铁民	82
	明代经济改革家周忱	吴申元	87

唐平淮西之役	林 岷	92
--------	-----	----

- 文史信息 • 西施究竟下落如何(96)元杂剧繁荣原因新探(96)
马家庄先秦宗庙遗址发掘简况(96)李鸿章是甲午
战争中的清方“主角”吗(97)刑天形象探源(97)

成语	每下愈况(每况愈下)	董 尽	98
典故	小巫见大巫	司 武	99

- 语言知识 • “一寸光阴一寸金”探源 汪维懋 100

青年园地	浅谈蜀汉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	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李开元	102
	“传奇”一词的含义与衍变	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罗德荣	106

- 书画欣赏 • 马麟《静听松风图》浅析 梁济海 110

- 文史信箱 • 宋诗派别 陈植锽 112

文史知识自测题	编辑部	119
---------	-----	-----

- 文史古迹 • 建筑艺术瑰宝——方泽坛 顾孟潮 121

- 文史研究动态 • 敦煌文学研究现状评介 健 宏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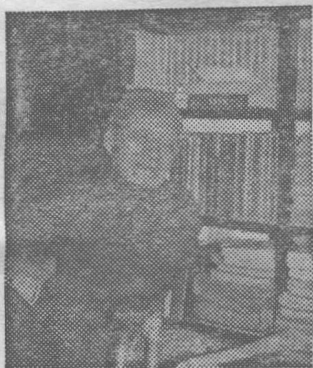
- 补白 8 则 • 目前之效与后日之忧(21)知人者智、自知者明(27)
读书五失(44)我国第一条铁路(57)天下其一身(67)
巧辩(70)晏子论忠臣(109)曾子不受赐(118)

《静听松风图》(封二)	方泽坛(封三)
-------------	---------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其他

——答《文史知识》编辑部问

钟敬文



钟敬文，生于1903年，广东海丰人。三十年代初毕业于陆安师范，三十年代留学日本。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一级教授，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等职。主要著作：早年著作多为散文、诗歌、论文等。近年出版专集有：《民间文艺谈藪》、《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等。

问：钟先生，您好！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读者来信，许多青年朋友想要知道民俗学是一门怎么样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作为一门科学，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您研究民俗学已经六十多年了，是我国民俗学研究领域的老前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民俗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具体点讲，它是一门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抬头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英

国经过产业革命，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它的社会 and 风俗习惯与过去以农牧业为主的封建社会的形态，有很大的差异。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产生一种从科学上给予解释的要求。据说，最早提出民俗学（folk lore）这个名称并倡议研究这门学问的是英国稽古学者汤姆斯（W. J. Thoms）。1846年他在名为《图书室》（The Athenaeum）的周刊杂志上以莫顿（A. Morton）的笔名提议用“民俗学”（folklore）这个萨克森语系的复合词来代替一向使用的“民间的古老风习”（Popular antiquities）。在英语中，folk意味着民众，lore是知识、学问之义。所以，folklore这个

术语概念的早期含义是指民众的知识和学问。它的内容包括传统的风俗习惯、信仰、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此后，英国于1878年在伦敦成立民俗学协会，并出版了会刊《民俗杂志》(The folklore Record)，1890年改称《民俗学》(Folklore)，这个名称便一直沿用到了今天。继英国之后，西班牙、法国、美国和德国先后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成立了民俗学协会及学会。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便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在德国，虽然学会的成立较晚，而民俗学的研究却早在进行，这是连英国的民俗学者也承认的。例如赫尔达的民谣采集于1807年发表，有名的格林的《德国神话学》于1835年出版。格林兄弟的童话采集在世界民俗学史上也可称为最早的卓越成就，等等。不过，德国不使用folklore一词，而把民俗学称为Volkskunde。德语的Volk与英语的folk不同，是指民族全体。德国民俗学的创立者里尔(W.H.Riehl)1858年在《科学的民俗学》的讲演中，提倡民俗学是研究德意志民族的学问。从民俗学的兴起来看，德国与英国不同。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是后起的。但是对民俗学的研究，德国甚至比英国还要迫切。因为德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要实行资本主义，就必须使国家统一。否则，那么多的壁垒，商品就不能流通。要统一，首先必须找出自己统一的民族精神。德国之所以把民俗学叫做Volk-

skunde，而不叫folklore，我想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由于民俗现象本身的普遍存在，由于近代许多民族、国家进行民族自我认识、争取民族独立以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管理殖民地等的需要，促使这门学科得到广泛深入的发展。民俗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引人注目的学问。

问：钟先生，前面您介绍了世界民俗学兴起以及发展的情况。请问中国民俗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您自己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民俗学的呢？

答：提起这些，回首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是近代社会和思想的产物。它传入中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大家知道，中国的现代新文化运动，是从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开始的。它的主要宗旨有两条，一条就是“德先生”，一条就是“赛先生”。也就是科学与民主。这两条很重要，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此外，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一条，这就是民族的自觉。中国民俗学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随着广大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随着政治、文化变革的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的。它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儿。

具体而言，在五四前夜，北京大学文科的教授们就建立了歌谣征集处，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不断地登载一些民间歌谣。这是我国近代民俗

学活动的最早开端。接着就是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及方言调查会的相继成立。在1922年底,北大正式创刊了《歌谣周刊》。本世纪二十年代,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便在我国一些国立大学里得到培植,并且逐渐成长起来。1927年末至1928年初由于政治和经济等原因,民俗学研究的中心从北京大学移到了广州的中山大学。早些时候,南方民众革命的浪潮正在高涨,而北方的军阀政府则更加反动和腐败。北方的一部分进步的学者、教授相继离开那里,奔向当时呈现着“希望之光”的南方。顾颉刚先生正是他们中的一位。他是后期《歌谣》周刊和《国学门周刊》的主持者,是当时民俗学活动的一个勇士。此外,还有董作宾、容肇祖和陈锡襄等先生。他们大都是直接参与过北大的民俗学活动(或受到它的一定影响)的人。在他们中间,当时我和杨成志等还是小弟弟。但从对这门学术活动的劲头说,也可以勉强算是他们的热心的伙伴。有了这样一批热心民俗学的人,中山大学于1928年初,正式成立民俗学会,并在短短几年中就出版了《民俗》周刊一百多期和民俗丛书近四十种。成为继北大而后,在南方树起的民间文化研究的新旗帜。三十年代前后,杭州又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继承和发展了北大和中大这方面的学术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北建立民主政权的地区,由于毛泽东同志提倡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和作家的思想改造,并指出民间固有文化的优点和对它学习的重

要,因而在解放区形成了采集和运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潮。这在指导思想上,显然是一个跃进。由于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偏重在文艺方面,并且是从革命文艺创作和作家思想改造着眼的,因此,虽然取得巨大成果,并为解放后这部分(民间文艺)工作的发展起了铺路作用,但是,对整个民俗学的活动却没有给予全面的关注。关于民间文艺的理论研究也未能充分展开(与当时正处于战争环境有关)。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逃避日本侵略军的缘故,许多原来在沿海大城市的学术机关及一部分知识分子,大都迁移到内地,特别是西南各省。他们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以及文学艺术,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取得某些成绩。但是,从指导思想说,却只是过去时期的继续。

这就是我国民俗学解放前所走过的一条曲折道路。总的看来,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我国民俗学还是在不断发展的,它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者和著作,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江绍原的《发须爪》,以及黄石、闻一多等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论文等等。

回想当年,我们还都是青年。我的歌谣、随笔就是在1923年写的。当时我们对民俗学只是感兴趣,并没有多少研究,对民俗学的意义也还是认识不足的。当然,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认识也就不断地有所提高。至于把民俗学的意义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上来认识，这是四十年代的事。现在看来，民俗学的研究确实是跟当时汹涌的民主主义、民族自觉的思潮以及跟这些思潮相应合的社会、文化革命实践运动密切相关的。从学术本身说，它是一种“新国学”运动；从社会思潮说，它又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不是主要的部分），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民族自觉等的反映。

问：我国目前民俗学的研究现状怎样呢？

答：我国在解放以后，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搜集、探究工作有较大发展。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社会情况也进行了广泛调查。在那些调查报告包含着丰富的民俗资料。但当时很少公开发表，自然也就谈不上对它的科学研究。总的说来，在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间，对于民俗学，在某些地区，或某些方面虽然做了一定工作，但是，民俗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这段历史说来有些令人痛心，建国以后，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民俗学的研究几乎成了禁区，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民俗学，民俗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回首看看，这类情形，给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小的损失。至于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文革”十年，连一般的学术研究都受到摧残，民俗学自然就更不必说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短短的几年间，民俗学不但已经从禁区内解放出来，而且呈现出活跃的姿态。

1978年夏，我与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六位同志联名上书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建议开展民俗学研究工作并建立有关研究机构。这不是我们旧习难忘，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需要。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大量的民俗材料，它客观上要求人们去搜集它、整理它、研究它。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连人民自己的文化都不去搜集，不去研究，是说不过去的。

现在，中国民俗学会已经成立；好些省市（甚至某些县、州）也先后成立了省级民俗学会或民俗研究小组；有些高等院校开设了这门功课，一部分师生共同建立了民俗学社；形式不一的专门性的民俗学刊物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民俗志一类的新书也开始出现在书店或图书馆的书架上了。可以说，现在民俗学的形势是相当喜人的。

问：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既然是民间的风俗、习惯，那么具体点讲，它的研究范围是哪些呢？许多读者来信都说这是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您能不能给解释一下呢？

答：民俗学所涉及的领域，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越来越广泛的。在民俗学兴起的初期，它所收集、研究的范围是比较狭窄的。可是今天，在有些国家里，它已经扩展到全部的社会生活、文化领域了。从社会基础（经济活动）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到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俗学研究的材料。概括地讲，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不外乎语言的传承、行动的传承、心意的传承三个方面。如过去各种劳动的组织、操作的表现形式、技术特点和所附着的信仰；又如过去社会中，有各类团体活动，象宗教的庙会，村落和宗族的组织形式及规例等，这些都是民俗现象。至于各地年节风俗，人的一生所要奉行的诸如婚丧等各种仪式，以及各种赛会、民间文学艺术活动等，它们从来就被算在风俗、习尚里面，这就不必细说了。

社会民俗现象虽然包罗万象，种类繁多，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他们大都有共同特点，就是这种现象，首先必须是社会的、集体的，而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作。即使有的原来是个人或少数人创立或发起的，但是他们必须经过集体的同意和反复履行，才能成为风俗。其次，它还跟集体性密切相关，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个别的，而是类型的或模式的。再次，它们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扩布的。即使是少数新生的民俗，也必须具有这种特点。总之，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一般说是集体的、类型的、继承的和扩布的。在这种特点上，它与那些一般文化史上个人的（或少数人）、特定的、一时的（或短时的）文化产物和现象便有着显著的不同。

我国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解放前主要是受英国的影响，范围比较狭窄，只要一提到民俗学的对象，大家就只想到传说、故事

歌谣、婚丧仪礼、年节风俗及宗教迷信等。其实，这种看法是比较陈旧的。解放后，我们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用民间文学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因为苏联是没有独立的民俗学研究的，它只是在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内，附带研究这门学问。而作为民俗学分支之一的民间文学却得到了特殊的重视。

今天世界上关于民俗学的范围和内容项目的看法差不多已发展到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当前我国的民俗学正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在它的研究范围和内容项目的看法上，也理应顺应世界学界的新潮流，再也不应固守英国民俗学或苏联民间文学的旧框框了。

问：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是这样广阔，如果一个青年想要从事这项工作，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答：这个问题不好笼统回答。首先要搞清楚，他是要做一个采集者？还是要做一个研究者？采集者与研究者是有区别的。采集者主要是提供材料的，研究者则在于进行研究。（当然，采集者可能上升为研究者，研究者也可以同时就是采集者，这里的区分只是相对的。）我这里先谈采集者。

采集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民间来的，都生活在无比丰富的民俗之中，就好像鱼活在水中一样。没有风俗，人的生活也就不可想象。所以，只要对民俗学活动有兴趣，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一个采集者，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一些记录。

当然，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他所记录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一样。他选择什么，记录什么，从什么角度去记录，如何记录，这直接关系到他所记录的东西有没有价值。这里就有观点技术问题。所以，同志们如果有志作为一个采集者的话，最好还是先看几本民俗学的入门书，譬如最近出版的日本后藤善等著的《民俗学入门》，就是一本较好的入门书。至少要搞清楚什么是民俗，民俗的研究有什么意义，采集民俗材料有哪些应该具备的技术等等。这样，你就会知道去选择那些最有价值的民俗材料，并且以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忠实记录原始材料等。

如果你是要作为一个研究者，那么要求就要高一些了。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现代社会中的民俗事象，所以我们今天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对这些民俗事象进行田野采集并加以科学整理。在这基础上，用马列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它进行客观的研究。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由于民俗事象多半是人们习见而又解释不清楚的东西，譬如放风筝、划龙船、吃粽子等风俗。几乎每一种风俗都有一种民间的解释，什么风筝是韩信造的，木偶是陈平造的，吃粽子同屈原有关等等。这些说法在文献上都有记载，并且历代流传下来。其实这些东西，十个里面恐怕没有几个是可靠的。我们今天的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给它们以真正科学的解释。而这是颇不容易的。要做到这点往往需要有辨别地采

用现代那些有效的技术性方法，诸如比较法、统计法等等。有时甚至需要应用多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所以，作为一个研究者，首先必须具备相当的科学知识。

我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我越来越觉得知识不够用。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对刘三姐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曾经写过一篇短文。现在八十多岁了。前几年又写了一篇关于她的文章。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是断断续续地思索了几十年。可是有的方面还是没有搞清楚。譬如刘三姐是汉族人呢，还是少数民族的呢？这一点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了。她是少数民族的，关于汉族的说法是后起的。但是广东、广西这些地区少数民族很多，她是哪一个少数民族呢，是壮族呢，还是其它民族呢？如果是壮族，那么是住在哪个地方的壮族人民创作和传播的呢？要解决这些问题，你就必须对民族的迁移有所研究。此外，这个故事流传于两广地区，它们传承的情形是各不相同的。我那篇文章只解决了广西方面的问题，至于广东方面的问题以及族属等问题就只好绕过去了。绕过去从科学上讲是不对的，我现在因为年纪大了，精力、时间都有限，所以就只好用这种“绕”的办法。当然，无论是多么渊博的学者，当他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往往都需要临时补充知识。因为一个人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虽然看起来很多，但等到用在某一点上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够。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

科学家，他是应该活到老，学到老的。

现在有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有个研究生，（他是很有希望的青年学者）想作《龙的图腾的研究》的论文。我说，你最好不要做这个题目。一百多年来，世界的学者关于图腾不知写了多少著作。如果我们仅仅知道：图腾就是原始人认某种动物是他的祖宗或者同他的祖宗有关系的，并以此作为科学研究的指导是不行的。我讲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民俗学的研究高不可攀，而是说我们不要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有大量的民俗材料等待我们去研究。但科学研究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是不能只凭着兴趣从事的。中国有一个鲤鱼跳龙门的故事。据说龙门这个地方的水流很急，鲤鱼只有跳过了它，才可以成为龙。这当然只是传说，我觉得也可以用来比喻学术研究的艰难。在科学研究上，你如果要成功，你就要象鲤鱼那样能渡过惊涛骇浪。你就要付出代价，你就要坚韧不拔地进行到底。

问：钟先生，您上面的话，对我们很有教益。下面您能不能谈谈我国民俗学界当务之急应该干什么？

答：我国民俗学研究工作者的任务特别紧迫。一方面，由于主客观诸方面的原因，我国民俗学正面临着一个重新建立的局面，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另一方面是由于近二十年来，中国的习俗在急剧地改变，譬如服装吧，现在女同志连旗袍都不穿了。这些民

俗材料如果不及时抢救收集，我们以后是连服装变迁史都看不出来了。为了完成民俗学固有的历史和现实的使命，使我国民俗学有一个大的发展，我认为，下面几件事情是刻不容缓的。

第一个就是机构问题。应当鼓励各省市、自治区以至各专区、县等迅速建立民俗学会或民俗收集小组。使民俗学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组织并进行各地区民俗资料的普遍调查或专项调查，试行专题研究或概括研究。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近现代和古代的民俗资料及有关见解、言论。

第二个就是有计划地进行这方面工作人材的培养。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是在大学里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另一方面可以开办各种形式的讲习班、培训班。

第三个就是知识的更新。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正处于两种情况，老一点的同志过去是有一些知识的，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与世界民俗学界的距离拉大了。现在国外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有的文章我们甚至连名词都看不大懂。所以对老同志来说，是迫切地需要更新知识。年轻同志不是更新的问题，而是充实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必须加强国内外民俗学理论著作（包括入门的和专门的著作）的翻译、介绍。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离民俗学研究的现状和要求还相差很远，还需要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自然，知识的更新不仅限于世界方面的，国内方面的也一样。

汪洋辟阖 仪态万方

——谈《庄子》的语言艺术

曹 础 基

《庄子》是庄子学派关于伦理、哲学、政治、人生、学术的论文汇编，除其中《马蹄》、《胠篋》、《渔父》等篇类乎文艺性的杂文外，都不符合现代观念的文学作品标准。但大家都会承认，庄周是个才华出众的文学家。《庄子》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文学上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鲁迅认为：“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全集》第八卷 270 页）不是纯文学作品而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对读者有较强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其奥妙何在呢？这全得力于作者的语言艺术。

大量地创造寓言，是《庄子》语言艺术的主要特点。作者自称“寓言十九”，司马迁在庄周本传中说其书“大抵率寓言也”，都反映了《庄子》的实际。书中寓言，短者仅二十来字，长者达一千余言；有的整篇就是一个，有的连用十五、六个组成一篇；或议论之后以寓言证之；或寓言之后借题发挥；或议论中插入寓言，或寓言中展开议论；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

寓言并非《庄子》独有，先秦其他诸子的著作亦多有之。《庄子》寓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多为作者所创作。《韩非子》中的《说林》、《储说》等篇，收录了大量的寓言故事作为写作的准备，但所收集的多是民间传说或者历史典故，而《庄子》中的寓言则多“空语无事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为作者所虚构。其他子书的寓言多为短小故事，插入议论之中，以资譬喻或论证，而《庄子》中不少寓言则篇幅较长，甚至可独立成篇，将作者之议论，寄于寓言中人物之口。如《盗跖》、《说剑》、《秋水》等，均“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

(刘向《列女传》)这些故事，虚构了人物(或拟人形象)与情节，有对话，有动作，还有肖像、表情描绘，与《墨子》、《孟子》中基于实录的一些对话式的语录大不相同。当然，作者的写作目的还是在于论道说理，所以文中的虚构，作为议论文的逻辑论证来说，不算是科学的，但就文学创作的发展而言，却是一种进步，是我国文学史上自觉地运用虚构刻画各种形象的开端。

一部《庄子》不外为了说明一个“道”字，而作者又声言“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尽管如此说，作者还是发表了十余万言，而且言得可闻可见，使人觉得“道”“有情有信”。这是由于作者采用了取象、造象的手法，刻划了一大批“目击而道存”(《田子方》)的理想人物：南郭子綦(《齐物论》)、王骀、哀骀它(《德充符》)、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大宗师》)、黠工、温伯雪子(《田子方》)、牧马童子(《徐无鬼》)等等。这些形象，多具有齐生死，冥是非，以荣为辱，以丑为美，心虚神凝等特殊品格，是天道的化身。还有如奴隶起义的首领盗跖、名利之徒曹商等也描画得栩栩如生。全书着墨最多的是孔子与庄子。在作者笔下，孔子有时是个悟道者，可以开导其弟子；有时成了得道者的反衬角色，被人讥讽、奚落；而更多则是作为在老子等道家人物教育下“蹉然改容”，自称“粗陋”的“转变人物”。对庄子的描绘就更是生动而多采了：时而是一个辩者，时而是一位隐士，时而化作一只蝴蝶；时而显得通达无忧，时而被吓得魂飞魄散，时而穷得朝不保夕；他妻死可以鼓盆而歌，见骷髅可以梦中共语。庄周的实际生活，诚然不尽如此。这些描写，只不过是庄周某种精神状态夸张性的取象罢了。形虽不近，神却似之，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指事类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从纯文学的角度看《庄子》中的人物，是粗糙的，类型化的。但在史官重信、儒墨法诸家务实的社会风气中，作者能另辟途径，以意取象，作虚构故事塑造人物的尝试，不能不说是一位开创性的文学家。

《庄子》语言艺术的第二个特点是体物入微的描绘。描绘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手法。我国文学的描绘至宋玉始趋成熟，在先秦作品中，主

要是叙事与抒情言志，描绘并不多见。而《庄子》则异乎寻常，运用得多而出色（就先秦作品相对而言）。写大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逍遥游》）巨鱼“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外物》）都形神俱现，气势不凡。《齐物论》写厉风作而万窍怒号，模形拟声，有动有静，千变万化；《天运》篇写黄帝奏咸池之乐而声满天地，把政治上的文治武功，自然界的阴阳离合，日月运行，动植物的生长及听者感受的变化，与乐曲的旋律、意境融为一体，声情并茂，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刻画音乐的奇文。庖丁解牛（《养生主》）、佝偻承蜩（《达生》）、众史画图（《田子方》）、原宪居鲁（《让王》），皆人各如面。至若藐姑射山上的神人（《逍遥游》）、隐机而坐的南郭子綦（《齐物论》）、能破季咸看相的壶子（《应帝王》）、临渊履危而射的伯昏无人（《田子方》）等，这些神乎其神的形象，虽亦可见其情状，然非以神遇不能得其真，读来觉得有无穷的韵味。总之，太空、江海、飞禽、走兽、音乐、风云以及屠夫、渔父、画师、隐士、射手、儒生、相者，作者都有所勾勒，大大地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

在描写上能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关键在于作者善于观察，体物入微。如谓“蹢（niǎn 踩）市人之足，则辞以放骛（ào），兄则以妪（yù），大亲则已矣。”（《庚桑楚》）“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偏（biǎn）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歛（xǐ）之。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山木》）“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徐无鬼》）这些都属人情精微之处，不是具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洞察世故的话，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浓厚的抒情色彩，是《庄子》语言艺术的第三个特点。胡文英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无端。”（《庄子独见·庄子论略》）感慨无端，则不顾口之所出，以尽情为快。请看他一段议论：

谓己道人，则勃然作色；谓己谀人，则怫然作色。而终身道人也，终身谀人也，合譬饰辞聚众也，是终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

设采色，动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谓道谀人。（《天地》）

开头四句还是一般性的议论，接着四句就感慨万千而有所指责了，最后五句已忍耐不住对当权者的愤恨与蔑视。“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篋》）“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急，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山木》）义正辞严，理直气壮，直犯最高统治者之逆鳞。“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殫残天下之圣法”。（《胠篋》）公开对当世宿学表示了切齿的痛恨。但当作者描述道家的理想人物或发表高论时，则全然相反，必然带着满腔热情。如称“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天下》）虽“恶骇天下”而得道之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也’者，十数而未止也。”（《德充符》）甚至连栢树、游鱼、蝴蝶、泽雉、海鳖等等，都赋予了作者的性格，体现了道家人物的某种精神状态。司马迁说“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适己”就是随我所欲。所以文章虽然变幻瑰玮，而总有个“自我”在。

怪异与飞动的风格，是《庄子》语言艺术的第四个特点。周代传统的文风是：“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周书·毕命》）而《庄子》作者则相反。以“瑰玮”自称，认为“谡(chù)诡可观”（《天下》），这种怪异奇玮的风格，首先体现在作者好发“奇谈怪论”。如《胠篋》篇借跖之口说“盗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在当时以及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这无疑是一种大逆不道而又惊天动地的怪论。“分均，仁也”，比一部《论语》翻来覆去地解说的“仁”要深刻而又清晰得多。还有如谓“圣人之言”为“古人之糟粕”（《天道》）；“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庚桑楚》）“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饭牛而牛肥。”（《田子方》）乍一看来，似乎是作者危言耸听，而细加咀嚼，则感到无不在理，甚至比许多“至理名言”，深刻百倍。故虽似诳而可信。“正言若反”，此之谓乎！

奇异的另一体现是作者想象之奇特。为了说明“道”无处不在，竟然举出“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知北游》）；他批

评世人不安天命，撰写了一个最短的寓言：“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即莫邪，古之宝剑名）！’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大宗师》）生动奇特地勾勒了一种刻意强求的性格。《庚桑楚》篇写南荣趺独自去见老子，一见面，“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南荣趺惧然顾其后。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谓乎？’南荣趺俯而惭，仰而叹，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问。’”道家人物在作者笔下，总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神秘感。再如神农得知老师老龙吉去世的消息后，“隐几拥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知北游》）；庄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至乐》）。凡此种种，都有点不近人情。而正是这些违世异俗的地方，令人心惊目醒，进而引起探求作者所宣扬的天道的意趣。

刘熙载说：

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乌知非鹏之学为周耶？（《艺概·文概》）

使读者产生“飞”的感觉，原因在于文中多“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作者借助着幻想的翅膀，翱翔于海阔天空。或向往于“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的至德之世，或景仰于“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的神人；写鲲鹏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任公子钓鱼，以五十犢以为饵（《外物》）；剑分天下剑、诸侯剑、庶人剑三等（《说剑》）；马有国马、天下马之殊（《徐无鬼》）。总之，笔锋所及，常超尘脱俗，出人意外。加之行文上惯于跳跃，大幅度的转折捭阖。不少篇章由几个乃至十几个故事排比而成，故事之中，常有层出不穷的连类比喻。如《逍遥游》开头写大鹏南飞，忽而联想到鸟瞰九万里之下的大地景象；为了从浮力上解说鹏能飞九万里的原因，又引证于“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因蜩与鸪之笑大鹏，又连及适莽苍者、适百里者、适千里者。忽而道东，忽而道西，显得汪洋恣肆，烟雨迷离。但到关键处一语点明主旨，由开转合。开处似断，合处见续。时断时续，摇曳多姿，仪态万方，给那超尘脱俗的情思增添了羽翼。

这并非是在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天

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

瞿
林
东

史学评论是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学评论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这样一个领域，很有必要进行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这里，我简略地说说有关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几个问题。

一 史学评论的渊源

这里说的史学评论，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不同于人们对史事或一般历史人物所作的评论即史事评论。其实，如若从广义上来理解的话，上述两种评论都可以称作历史评论。不过为了便于讨论问题和说明问题，还是把它们略作一点区别为好。

从中国古代史学来看，史学评论是在史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的。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见《孟子·滕文公下》）。这是从《春秋》的内容和它的社会作用来评论的。但这只是孟子在同别人讨论问题时顺便讲到的，还不能看作是一种自觉的史学评论。

自觉的史学评论，大致以司马迁为开端。司马迁在讲到先秦史学时，评论《春秋》是“王道备，人事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同时也说

下》）一是感情充实。愤世疾俗，感慨万千，故文若喷泉，水花飞溅。二是才情充实。他熟悉历史，了解官场，洞察人情世态；他词汇丰富，具有极强的驾驭甚至创造语言的能力。同一论题，可以证之以史，证之以俗，证之以物理，证之以人情。他视野宽广，文思敏捷，放得开，收得拢，欲行则行，欲止则止，欲东则东，欲西则西，如鸟儿自由地出没于烟波云海，故使人感到飞动，感到光怪陆离。